

以生育权重读生态女性主义 ——弗朗索瓦丝·德奥波妮《女性主义或死亡》的当代阐释

苑华美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 弗朗索瓦丝·德奥波妮的《女性主义或死亡》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既有阐释多从女性与自然的共同命运出发, 而本文尝试以女性生育权为切入点, 对其进行当代重读。德奥波妮将避孕、堕胎等长期被视为私人领域的女性痛苦纳入社会历史结构之中, 使女性身体所承受的压迫获得理论可见性。在此基础上, 她进一步将生育权问题与人口危机和自然资源破坏相联系, 拓展了“生态”的政治内涵。文章指出, 德奥波妮的论述虽存在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局限, 但其对生育权归属的追问仍具有当代意义。在出生率下降与生育意愿减弱的今天, 生育权不应仅被视为女性身体自主问题, 更应置于人类再生产、社会延续与地球未来的整体视野中重新考察。

关键词: 弗朗索瓦丝·德奥波妮; 《女性主义或死亡》; 生态女性主义; 生育权; 生命政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574

一、引言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弗朗索瓦丝·德奥波妮 (Françoise d'Eaubonne, 1920—2005) 在《女性主义或死亡》(*Feminism or Death*, 1974) 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 这一概念, 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开端。德奥波妮并未将女性解放问题局限于两性平等或阶级斗争的框架之内, 而是将其置于全球生态危机与现代文明危机的语境中加以重新思考。在她看来, 环境破坏与人口膨胀等现代危机的深层根源不仅源于阶级矛盾或生产方式, 更与父权制对女性生育权的支配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破坏密切相关 (d'Eaubonne 26)。

在既有研究中, 德奥波妮的生态女性主义往往被置于“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框架中加以考察。例如, 《劳特利奇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feminism and Literature*, 2023) 便以生态女性主义为思想核心, 收录了一系列从文学研究角度探讨女性与自然交叉关系的文章。瓦科赫在前言中指出, 德奥波妮的“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探讨自然的支配与女性的压迫之间的关系, 并致力于使自然与女性从剥削中解放出来” (Vakoch xxv)。

然而, 在提及德奥波妮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时, 书中论述多侧重于说明父权制对女性与自然的双重压迫, 而较少进一步追问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联究竟如何形成。例如, 阿布希·古普塔 (Abhik Gupta) 将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视为人口过剩与环境破坏的重要根源, 认为女性贬抑与自然亵渎可以被置于同一压迫结构中理解 (88); 妮可·阿纳埃 (Nicole Anae) 则指出, 生态女性主义既是对父权制科学的批判, 也是对环境破坏的关注, 并将二者与女性压迫联系起来 (291); 妮可·C·迪特默 (Nicole C. Dittmer) 亦将生态女性主义概括为一种强调自然与女性之间长期相互关联的理论, 其目的在于使这两种从属主体摆脱父权制压迫 (428)。

然而, 比起“女性与自然如何被父权制压迫”的问题, 更需要回答的是, 女性与自然之间究竟以何为连接点? 纪秀明 (2023) 从本质主义视角指出, 以德奥波妮为代表的早期生态女性主义多从身体和精神层面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亲缘性与镜像关系 (70)。这一理解虽为把握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理念提供了切入口, 但也可能使德奥波妮的思想被简化为“女性亲近自然”的单一命题。

事实上, 在德奥波妮的《女性主义或死亡》中, 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并非仅仅建立在象征性亲缘之上, 而

是通过生育权的归属问题被具体化：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能力的支配，正是连接女性压迫、人口膨胀与生态危机的关键（d'Eaubonne 65, 67）。因此，本文试图以“生育权归属”为线索，重新阐释德奥波妮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德奥波妮并非只是隐喻式地并置女性与自然，而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人口膨胀、避孕与堕胎权受限等现实问题出发，将女性生育权的丧失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纳入同一套父权制支配逻辑之中。德奥波妮的生态女性主义并非脱离现实语境的将自然与女性简单类比，而是在特定时代危机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性理论回应。

二、从雌鼠到女性：拒绝繁殖的生存理性

1958 年，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郊外一座不起眼的石砌谷仓中，动物行为学家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将一批白挪威鼠置入一个几乎“乌托邦”式的封闭空间之中：那里食物和水源充足，没有天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按照常理，这样理想的环境应当有利于种群的繁殖和扩张。然而，实验的结果却呈现出相反的图景：随着鼠群密度上升，求偶、性行为、筑巢、繁殖、幼崽照料和社会组织均出现严重紊乱（Hall 26）。卡尔霍恩后来以“行为沉沦”（behavioral sink）概括这种由拥挤状态引发的群体行为失序：“所谓‘行为沉沦’，指的是动物因过度聚集而陷入的一种异常行为状态。该术语所具有的病理性含义并非偶然，因为行为沉沦确实会强化群体内部已有的各种病态表现”（Calhoun 144）。

卡尔霍恩的实验为德奥波妮思考人口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指出，人口激增与环境保护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两项严重威胁（d'Eaubonne 65）。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她在第二章“从革命到演变”（From Revolution to Mutation）中专门设置“老鼠的压力”（The Stress of the Rat）一节，讨论卡尔霍恩的白挪威鼠实验对人类社会以及女性主义的启示。对德奥波妮而言，该实验的意义在于，它将人口膨胀从抽象统计数据转化为可见的社会与繁殖危机：当种群数量增长超出空间和社会秩序的承受能力时，危机并不只表现为数量过剩，也会表现为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崩溃、社会关系的失衡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化。她由此将人口密集与癌症、精神疾病等现代病理现象相结合讨论，指出城市中患癌率增长与人口密度、环境恶化之间存在关联（d'Eaubonne 65-66）。而这些疾病的成因共同指向了人口密集所造成的生活条件恶化。德奥波妮写道：“当乡村变得荒芜，整个村庄因污染的河流而坍塌，河中满是死鱼时，大都市中因世纪初的种种‘不便’而形成的密集人口分布状况，使得生活条件急剧恶化，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其称为一场灾难”（d'Eaubonne 65）。

可见，德奥波妮并不是将人口膨胀视为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是将其理解作为一种同时作用于身体、心理、社会关系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性生存危机。这一点也与卡尔霍恩对实验中拥挤状态的理解相呼应：在多数情况下，密度本身并不必然造成压力，真正的问题在于拥挤破坏了群体赖以维持的社会功能（Hall 26）。也就是说，卡尔霍恩实验所揭示的并非单纯的空间不足，而是空间、等级、领地、求偶、筑巢和育幼秩序的整体失衡。

在实验中，雌鼠和幼崽受到失序状态的影响尤为明显。正常情况下，雌鼠会完成筑巢、整理幼崽和转移幼崽等照料行为，而在“沉沦”状态中，雌鼠常常无法完成筑巢，导致幼崽散落、混杂，甚至被踩踏或吞食（Hall 28-29）。同时，雌鼠也是最先承受繁殖压力和群体骚扰的主体。霍尔在描述求偶与性行为失序时指出，“三到四只雄性可能会同时跟踪一只受惊的雌性。……它们不会在洞穴入口处停下来，而是会跟着雌性进入洞内，让雌性毫无喘息之机”（Hall 28）。这种持续性骚扰不仅破坏了正常的求偶秩序，也直接影响雌鼠的妊娠与育幼过程。霍尔进一步写道：“雌性老鼠的死亡率是雄性老鼠的三倍半。……雌鼠不仅流产率显著增加，而且因子宫、卵巢和输卵管的疾病而死亡”（Hall 30）。

显然，卡尔霍恩实验中的繁殖危机并非单纯表现为种群数量下降，而是首先体现为雌性身体在空间压缩、群体骚扰与社会秩序失衡中的受损。这也说明，繁殖并不是脱离环境压力而自动实现的自然过程，而是依赖于社会秩序与身体承受能力等的复杂实践。这样一来，雌鼠毁巢穴并拒绝交配的行为使“拒绝繁殖”本身获得了新的意义：当繁殖环境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时，拒绝繁殖不应被简单视为反自然或病态，而应被理解为生育主体在极端种群压力下对繁殖秩序的中断。它既揭示了雌性身体的承受极限，也暴露出种群繁衍秩序的失衡与反噬。

正因如此，德奥波妮特别强调这一现象，并引用法国杂志《一切》（*Tout*）的评论，将卡尔霍恩实验中的雌性繁殖困境与女性生育权问题联系起来。该评论把女性争取避孕与堕胎权的运动同实验中母鼠的拒绝繁殖相并置，

并将这一运动阐释为一种生存性抵抗：当生存环境已经不适合继续无节制地繁殖时，对生育的拒绝反而可能意味着对种族延续的保护。文中写道：“那么，女性当前争取自由获得避孕手段和堕胎权的运动，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生存诉求的一种转译？因为唯有出生率的下降，才可能保障人类种族的延续”（d'Eaubonne 66）。

德奥波妮承接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将这一问题明确指向父权制社会对生育权的垄断。她指出：“由于男性社会将人类生育权据为己有并加以独占性支配，我们正濒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如果生育率掌握在女性权力手中，或者更简单地说，由两性共同决定，它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当前这一极为严峻的危机本不会存在”

（d'Eaubonne 67）。可见，在德奥波妮看来，生态危机与人口危机源于父权制社会对生育决策权的制度性占有。避孕与堕胎权因此不只是女性个人的身体权利问题，也成为重新调整人类与自然、繁殖与生存之间关系的政治前提。

要理解德奥波妮何以将女性生育权问题与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相联系，就必须回到她对父权制，或者说“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ratism）的界定。在“迈向全球女性主义宣言”（For a Planetary Feminist Manifesto）小节，德奥波妮指出，阳具中心主义“既对应于一种心理结构，也对应于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政治与社会事实”（d'Eaubonne 79）。作为一种心理结构，阳具中心主义指的是以是否拥有阳具这一自然事实为依据，来确认并辩护男性权力的正当性（d'Eaubonne 79）。换言之，它将身体差异转化为社会等级，并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伪装成某种“自然秩序”。随着文明的发展，阳具进一步从身体器官转化为象征性权力，体力、攻击性、金钱等都可以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阳具符号”（phallic symbol）（d'Eaubonne 79）。在这一结构中，女性则因缺失阳具而被定义为男性的服从者：“女性就是那种要服从于男性的个体”（d'Eaubonne 79）。而这种由男性定义、承载着阴茎象征意义的女性身份，正是在一系列限制中形成的：她不是男性，她不能像男性那样行事，她离不开男性。与一个男人共同生活并生育子女，成了她这种存在方式的唯一正当理由（d'Eaubonne 79）。

当相夫教子成为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存在的唯一正当性时，女性的生育权也随之被纳入男性权力的支配之下。德奥波妮指出，历史上流传的限制女性生育能力的仪式、迷信和秘密实践，正是女性试图掌控自身生育的表现（d'Eaubonne 80）。然而，男性书写的历史却长期遮蔽这些避孕实践；与之相反，关于受孕和生育的民间传说却被大量保存下来（d'Eaubonne 80）。正如德奥波妮所言：“倘若‘科学不像其他事物一样仍掌握在男性手中’，那么‘有效的避孕方法和堕胎自由早就已经进入道德领域之中了’”（d'Eaubonne 80）。可见，避孕与堕胎之所以长期无法获得正当性，并非因为女性没有控制生育的需求，而是因为科学、道德和历史叙述都参与了父权制对女性生育权的压抑。

因而，德奥波妮将女性与生态联系起来的方式，并不是诉诸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同一性，而是以生育权为中介，揭示父权制如何通过控制女性身体组织人口生产，并由此制造人口膨胀、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卡尔霍恩实验中的雌鼠拒绝繁殖，使她得以重新理解“拒绝生育”在生存危机中的意义。女性争取避孕与堕胎权，也因此成为对父权制人口生产秩序的政治抵抗。由此，女性生育权不再只是私人身体权利，而成为理解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问题的关键入口。

三、从避孕到堕胎：父权制对生育权的占有

如果说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吹响了“个人的即政治的”号角，开启了将私人经验政治化的叙事路径（陈雪飞 85），那么德奥波妮将女性生育权问题指向人口膨胀与生态危机，正是对这一号角的强烈响应。卡尔霍恩实验所呈现的是一个在拥挤、骚扰和秩序失衡中逐渐失控的繁殖系统；而在德奥波妮看来，20 世纪 70 年代的人类社会同样处于人口膨胀与生态危机的历史压力之下，女性却长期缺乏对自身生育的实际控制权。避孕知识的匮乏、科学避孕手段的不普及、堕胎禁令，以及婚姻内部丈夫对妻子身体的“合法”支配，使女性身体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纳入父权制的人口生产秩序之中（d'Eaubonne 67）。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奥波妮专门在“老鼠的压力”和“关于堕胎”（Regarding Abortion）两个小节中探讨女性的避孕与堕胎权问题。她将这些长期被视为私人领域的女性痛苦纳入社会历史叙事之中，使女性私人经验得以被历史化与政治化，也使被遮蔽的“女性私人悲剧”获得公共性和理论可见性。

在避孕问题上，德奥波妮揭示了一条长期被男性历史遮蔽的女性避孕经验脉络。她指出，避孕并非现代技术

出现后的新发现，而是女性长期以来以想象性的甚至危险的方式持续实践的身体经验（d'Eaubonne 68）。德奥波妮列举了多国女性曾秘密使用过的避孕方式，想象式的如“法国女性会偷偷地携带蝾螈；德国女性会携带一只小鼠的睾丸；英国女性则会使用迷迭香和月桂树……在日本，紫水晶被视为避孕药；在中世纪的欧洲，绿宝石备受珍视”等（d'Eaubonne 68）。更为危险的则是医学与迷信方法的结合：古代的女人们用柳树皮熬制一种避孕茶，其中流行的成分包括小亚细亚地区的骆驼口水，甚至是俄罗斯的炮弹粉和油汞药丸（d'Eaubonne 68）。

与之相反，男性书写的历史却往往只记录促进受孕的护符、药剂和爱情魔法，遮蔽了女性自古以来对于避孕的需求。德奥波妮进一步指出，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同样呈现出迟缓、断裂与男性中心化的特征。1856年，美国人索尔（Soule）通过印第安人的避孕经验发现了防止排卵的方法，避孕问题才逐渐进入科学探索的范围（d'Eaubonne 68）。然而，此后这一问题却长期被搁置，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避孕问题与人口问题才重新被提出：1950年，美国社会学家诺曼·希姆斯（Norman Himes）继续探讨这一被中断的问题；1955年，马萨诸塞州的医生们才开始研究开发避孕药（d'Eaubonne 68）。德奥波妮借此强调，避孕技术的迟滞并非单纯源于科学能力的不足，而是与男性社会对人口生产的支配意愿密切相关。她指出，避孕方法长期主要限于体外射精与男用避孕套，而这两种方式都将避孕的实际控制权交给男性，依赖他们的“自制力、诚信乃至清醒程度”（d'Eaubonne 68）。

可见，女性并非没有控制生育的需求，而是长期缺乏能够自主支配身体的避孕条件。正如德奥波妮所说，社会结构由此显露无遗：“生育被视为男人的事务，他既可以自由地将其强加于女性，也可以自由地加以拒绝”（d'Eaubonne 68）。因而，在德奥波妮这里，避孕权并不是单纯的医学技术问题，而是女性能否从父权制人口生产秩序中夺回生育决策权的关键之一。

与避孕问题相连的是堕胎权。相较于避孕这一妊娠前控制，堕胎则更直接暴露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占有。从1920年开始，法国法律便规定，“所有对自身或他人实施堕胎行为者，以及帮助堕胎者，都将面临监禁与罚款”（d'Eaubonne 74）。直至1971年，一份由343名承认曾堕胎的女性签署的《343宣言》（“Manifesto of the 343”）发表时，这一刑事化堕胎的法律框架才开始动摇。宣言中，343名女性冒着刑事诉讼的风险，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堕胎，以集体自我暴露的方式挑战父权制社会的人口生产秩序。

德奥波妮将《343宣言》视为法国新女性主义进入公共视野的关键事件（d'Eaubonne 73）。在她看来，这一宣言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女性公开承认自身的堕胎经历，更在于它证明了女性意识觉醒为何首先集中于避孕与堕胎问题。女性固然在职业、工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等方面长期遭受压迫，但避孕与堕胎直接关系到女性最私密、最个体化的身体经验，也关系到人口生产与人类生存危机的整体结构（d'Eaubonne 73）。然而，围绕《343宣言》的发表却爆发了强烈的反对声音：医学、宗教、法律、家庭伦理乃至民族主义话语纷纷将堕胎描述为谋杀、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和社会崩溃的象征（d'Eaubonne 73-75）。德奥波妮借此揭示出，父权制真正恐惧的并不是堕胎本身，而是女性将自身生育权从父权制的人口生产秩序中夺回。

为了进一步揭示堕胎禁令的真实代价，德奥波妮转述了加拿大女性解放运动中一次支持堕胎权行动的场景。示威者抬着一口棺材，上面摆放着秘密堕胎中使用的塑料袋、织针、来苏水和吸尘器部件等器具，并以朗读的方式揭示这些器具在秘密堕胎中的使用过程：

棺材上放着一些塑料袋；它们被用来填塞子宫，迫使子宫发动分娩。由于这些塑料袋未经消毒，可能导致严重感染；即使感染没有致命，也会造成不孕。棺材上还放着织针。它们被插入阴道，用来刺穿子宫，最终导致大量出血。棺材上还有一瓶来苏水。那原本是用来清洁地板的。想要堕胎的人会把它注入阴道。阴道组织会被严重灼伤，并发生出血。死亡会在几分钟内到来，而此前的疼痛剧烈、灼烧、令人无法忍受。棺材上还放着一段吸尘器部件。管子被置于阴道口，用来吸出胎儿，结果整个子宫都被吸出并拖离盆腔。（d'Eaubonne 76）

通过对这一惨痛的场景的复述，德奥波妮将堕胎行为从抽象的法律和道德争议重新拉回女性身体本身：禁止堕胎并没有杜绝堕胎行为，只是把它推入秘密、危险和死亡之中。

总的来说，从避孕到堕胎，德奥波妮揭示的并不是两个孤立的身体议题，而是父权制对女性生育权的持续占

有：女性既难以在妊娠发生之前自主避孕，也难以在妊娠发生之后安全堕胎。正是在父权制的人口生产秩序中，女性身体被迫承担控制生育过程中的风险、痛苦与死亡代价。由此回看卡尔霍恩实验，雌鼠拒绝繁殖并不只是“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简单对应，而更像是一种在繁殖条件崩溃之后出现的生存自救。实验中的雌鼠在拥挤、骚扰和秩序失衡中失去了安全筑巢、妊娠与育幼的条件；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则在避孕受限与堕胎受禁的双重压迫中失去了安全控制生育的条件。二者共同说明，繁殖并非脱离社会与环境条件的自然本能，而是深受空间秩序、社会权力与身体安全制约的生命实践。因此，在德奥波妮看来，女性争取避孕与堕胎权并不是对生命的拒绝，而是对父权制强制繁殖秩序的拒绝；它所指向的不是死亡政治，而是在生态危机与身体压迫双重压力下，面向人类生存危机的自救行动。

四、从女性生育权到生态政治：德奥波妮理论的贡献、限度与当代启示

德奥波妮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她以生育权为中介，重新解释了女性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她并未简单诉诸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同一性，而是将女性身体置于人口生产、父权制权力和生态危机的交叉点上加以考察。在她看来，女性之所以与生态问题发生关联，并不是因为女性天然属于自然，而是因为父权制通过占有女性生育权来组织人口生产，而人口膨胀、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又正是生态危机的重要表现。由此，女性身体不再只是私人领域中的生理身体，而成为理解人口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政治入口。

其次，德奥波妮将父权制批判从性别压迫层面推进到生态政治层面。她所批判的阳具中心主义并不只是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占有女性生育权来控制人口生产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女性被规定为妻子和母亲，被剥夺避孕与堕胎的自主权，因而被迫承担无节制繁殖所带来的身体风险与生命代价。同时，父权制对生育决策权的垄断又推动了人口膨胀、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由此，生态危机并非单纯源于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技术现代性，而与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生育能力的制度性占有密切相关。

然而，这一理论路径也潜藏着本质主义风险。德奥波妮试图批判父权制将女性固定为“自然的女人”和生育者，却又在论证中高度依赖女性与生育能力之间的关联。她通过生育权将女性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虽然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人口生产的控制，却也可能暗示女性主体的核心经验在于生育或拒绝生育。这样一来，其理论不仅可能弱化女性经验内部的差异，也可能将无法生育、已绝经、跨性别女性，或不以生育经验界定自身的女性排除在视野之外。

尽管如此，德奥波妮关于生育权与人口政治的思考，仍为理解当代从人口膨胀到低生育率的时代转向提供了重要参照。与20世纪70年代人口爆炸的语境不同，21世纪社会面临的人口问题已经转向出生率下降与生育意愿减弱。联合国2025年的报告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已从20世纪60年代每个妇女生下约5个孩子降至2024年的约2个（United Nations 3）。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24年的报告也指出，OECD成员国平均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3.3下降至2022年的1.5，平均下降了一半以上（OECD 14）。显然，生育问题的时代语境已经从“人口过剩”转向低生育率与再生产危机。

然而，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德奥波妮关于生育权的思考已经失效。相反，它提示我们：无论国家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只要女性身体仍被视为人口生产的工具，生育就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生命实践。德奥波妮所批判的是女性缺乏拒绝生育的自由，而当代低生育率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并不只取决于生育意愿本身，也取决于社会如何分担怀孕、生产、哺乳、育儿、职业中断和照护劳动等再生产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仍主要由女性及其家庭承担，那么“鼓励生育”便可能以新的形式延续对女性身体和劳动的征用，也难以真正回应低生育率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再生产危机。

因此，德奥波妮生态女性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从人类命运与地球未来的视角重新理解生育权问题。生育权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关涉女性身体自主性的斗争，更因为它关系到人类再生产秩序能否以更加平等、可持续的方式展开。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已不再只是人口过剩所引发的环境压力，也包括低生育率、老龄化和再生产意愿下降所带来的人类延续风险。只有当女性身体不再被视为国家、家庭或市场调配的人口生产工具，怀孕、生产、育儿和照护劳动的成本得到社会性承认与分担时，生育才可能从父权制或人口治理压力下的义务，转化为面向人类未来的自由选择。

参考文献:

- [1] D'EAUBONNE F. *Feminism or Death*[M]. Ruth Hottell, Tran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22.
- [2] VAKOCH D A.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feminism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 [3] GUPTA A. Bengali Literature and Ecofeminism[C]//Douglas A. Vakoch,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feminism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88-100.
- [4] ANAE N. Cultural Studies and Ecofeminist Literature[C]//Douglas A. Vakoch,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feminism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290-300.
- [5] DITTMER N C.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Ecofeminism[C]//Douglas A. Vakoch,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feminism and Literature*[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428-437.
- [6] 纪秀明. 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 330(2): 69-77.
- [7] HALL E T. *The Hidden Dimension: An Anthropologist Examines Man's Use of Space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6.
- [8] CALHOUN J B.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2, 206(3): 139-148.
- [9] 陈雪飞. 个人化政治叙事——一种西方左翼女性主义的视角[J]. 国外社会科学, 2022, (4): 84-92+198.
- [10] UNITED NATIONS. *World Fertility 2024*[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5.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world-fertility-2024>.
- [11] 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2024: OECD Social Indicators*[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4. <https://doi.org/10.1787/918d8db3-en>.

Rereading Ecofeminism through Reproductive Rights: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Françoise d'Eaubonne's *Feminism or Death*

Yuan Huam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Françoise d'Eaubonne's *Feminism or Death* is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ecofeminism. Existing interpretations often approach it through the shared fate of women and nature, whereas this article reread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D'Eaubonne incorporates women's suffering related to 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long regarded as matters of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broader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ructures, thereby rendering theoretically visible the oppression endured by women's bodies. On this basis, she further links reproductive rights to population crisi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xpanding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ecolog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lthough d'Eaubonne's discussion contains certain essentialist and universalist limitations, her inquiry into the ownership of reproductive rights remains significant today. In an era marked by declining birth rates and weakening reproductive willingness, reproductive rights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merely as a question of women's bodily autonomy. Rather, they should be reconsidered within a broader vision of human reproduction, social continui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Keywords: Françoise d'Eaubonne; *Feminism or Death*; ecofeminism; reproductive rights; biopolitics